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的“链式”治理诠释

——国家审计、国企信用与中小企业融资纾困

徐玉华^{1a,1b}, 刘梦娜^{1a,1b}, 王浚丞²

(1. 南京审计大学 a. 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 b. 统计金融联合实验室, 江苏 南京 211815; 2. 同济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92)

[摘要] 中小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日益凸显, 探索多元化纾解路径至关重要。以 2009—2019 年沪深 A 股央企集团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从供应链金融视角切入, 考察国家审计对纾解其链上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作用。研究表明, 国家审计能够增强国有企业对链上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 机制检验发现, 国家审计可以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优化内部控制质量及增强高管风险承担意愿三条路径发挥作用; 异质性分析表明, 该强化作用在非产融结合企业、法治水平高、市场竞争程度高时更显著。基于实证证据, 将国家审计的治理效能拓展至供应链金融这一新兴领域, 揭示了“审计介入—国企信用传导—中小企业纾困”的链式治理路径, 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在产业链治理场景中的解释维度, 为构建扎根中国实践、回应现实命题的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学理支撑与经验证据。

[关键词] 国家审计; 供应链金融; 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 国有企业; 中小企业融资

[中图分类号] F239.4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4833(2025)06-0010-10

一、引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中小微企业资金短缺、融资难问题凸显, 供应链金融成为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境、落实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2020 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联发《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 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首次明确定义供应链金融是指在真实贸易背景下, 应用金融科技手段整合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等信息, 依托供应链核心企业构建上下游一体化的“金融供给体系和风险评估体系”, 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出发点, 以支持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为着力点。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顶梁柱”, 在供应链中占据主导位置^[1], 国家政策明确表明国有企业应充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 依托供应链金融服务, 为链上中小企业融资增信, 从而助企纾困。如 2022 年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协同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强调, 央企应积极搭建供应链金融平台, 基于真实贸易背景为中小企业信用赋能, 助力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等。然而实践中, 国企凭借强势地位假借供应链金融名义, 损害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屡禁不止^[2], 叠加其不愿意、不确权、不信息共享等问题^①, 阻碍了国企信用的有效传导。这一政策预期与实践的落差致使纾困目标难以实现。因此, 探究如何有效推动国企积极发挥供应链核心企业作用, 助力中小企业纾解融资困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国有企业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 既是服务国家战略部署, 发挥“链长”作用以纾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责任所在, 亦是保障所处供应链稳定、提升自身市场竞争力的必要之举。然而, 国企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收益和风险存在结构性失衡, 其不仅需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或承担连带责任, 还需承担额外的财务与管理成本^②, 但短期收益仅为微薄的中小企业融资利差, 因此, 国企高管具有短视行为^[3], 往往缺乏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积极性。即使参与, 国企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回报, 凭借其强势地位攫取中小企业合法权益的违

[收稿日期] 2025-0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03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72342019); 江苏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4KJA120002);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KYCX25_2453); 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南京审计大学统计金融联合实验室开放课题(2025JLSF203)

[作者简介] 徐玉华(1975—), 男, 湖北仙桃人, 南京审计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从事供应链金融与非线性金融系统研究; 刘梦娜(1997—), 女, 江苏无锡人, 南京审计大学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国家审计与供应链金融风险研究, 通讯作者, E-mail: mnlou@stu.nau.edu.cn; 王浚丞(2000—), 男, 江苏连云港人,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从事审计与公司治理研究。

①根据《中国供应链金融生态调研报告 2024》(<https://www.rmbs.ruc.edu.cn/docs/2024-03/90bfa432bbf49f98a810914a8a7958.pdf>), 核心企业不愿意、不确权、不共享信息等是阻碍中小企业通过供应链金融融资的主要原因。

②如国有企业建立供应链金融平台、供应链金融风险控制体系的财务与管理成本等。

规行为屡屡上演^[2],如拖欠中小微企业款项或收取质价不符的服务费等,致使国企供应链金融服务质效弱化。因此,亟须引入强有力的外部治理机制,构建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4],以确保国企信用能够精准、高效地赋能中小企业。

国家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构成,其凭借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这一“看家本领”和党中央赋予的其他监管机构所不具备的高效权威及震慑力,与供应链金融业务监管有着天然适配性。国家审计能够揭示国企供应链金融业务中的不规范操作并督促其整改,提高信息透明度,如《中国中丝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收支等情况审计结果》披露“所属中丝海南公司在无相关贸易背景的情况下,违规开具银行承兑汇票 2.28 亿元”等。国家审计能够有效遏制国企的机会主义与道德风险行为,保障贸易背景真实性,从而净化信用传导环境。同时,国家审计能够通过“激励-容错”协同机制,有效增强国企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从而提高其通过供应链金融为中小企业商业信用赋能的积极性。此外,国家审计对国企内部控制体系的重点关注有助于完善其贸易业务内控体系,例如《中国林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收支等情况审计结果》披露“中林集团信息化建设较为滞后,贸易购销等业务尚未建立信息系统”等。国家审计有助于从制度源头提升其业务管控能力,为供应链金融长效纾困中小企业奠定坚实基础。

基于此,本文以 2009—2019 年央企控股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在供应链金融视角下,国家审计能否强化国有企业对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通过实证分析延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研究范畴。现有文献多聚焦国家审计对国企 ESG 表现^[5]、产学研合作创新^[6]等的影响,本文将审计治理功能延伸至供应链金融这一新兴领域,系统阐释了国家审计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增强高管风险承担与完善内部控制,推动国企信用向链上中小企业有效传导的“链式”治理逻辑,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在产业链治理领域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实证依据。第二,拓展了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分析视角。已有研究多从企业自身、金融机构等视角切入,虽提供了供应链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有力证据,但仅关注以商业信用为资产的供应链金融是否能够助企纾困,未能充分揭示核心企业即国有企业在信用供给端的关键作用。本文立足多元视角,将理论视野延伸至信用供给端,构建了纾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新分析框架。第三,深化了国家审计在产业链治理中的理论内涵。已有文献大多考察供应链金融带来的经济后果,如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7]、对企业价值的影响^[8]等,本文则从审计监管视角切入,揭示国家审计对国企履行供应链核心主体责任的关键驱动作用,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在维护产业链稳定、服务实体经济方面的治理角色提供了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二、文献综述

中小企业与其他主体间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其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9]。中小企业往往缺乏提供规范财务报表的能力及相应的信息披露机制,故而无法满足传统信贷评估要求,且没有足够的可抵押担保资产,因此难以获得足够的融资资源^[10]。已有大量文献基于不同视角对破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如有学者认为中小企业自身能通过数据资产化^[9]等来提高信息透明度,从而缓解其融资约束;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加深数字技术与信贷业务的融合能够降低其信息成本,从而降低对中小企业抵质押资产的依赖^[11]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不仅会影响其自身经营,还会影响供应链整体稳定性^[1]。特别地,一旦供应链中小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法持续,由于供应链的传导性,其风险将传递至供应链的最末供给端,从而导致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对供应链核心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产生不利影响^[1]。基于此,以真实贸易背景为依托,供应链核心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以帮助其融资的供应链金融模式应运而生。

供应链金融不仅是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有效机制^[12],还是支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升级的有效手段^[13]。早期学者关注供应链金融的形成原因及其带来的经济后果,分析了微观经济主体基于丰富融资方式、提升运营效率等需求侧视角开展供应链金融的原因^[14],并指出供应链金融能够提高企业价值^[8]。2022 年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协同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指出供应链金融是纾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重要方向,然而现有文献大多仅探讨了供应链金融如何纾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如付玮琼等^[15]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降低中小企业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从而显著缓解其融资约束,等等。然而事实上,供应链金融服务效能严重依赖核心企业的业务规范性和信用稳健性。核心企业凭借其供应链强势地位侵占中小企

业合法权益的违规行为已不是个例^[2],同时,供应链企业为短期资金需求,伪造贸易背景,利用核心企业骗取融资等行为,不仅会影响核心企业市场竞争力、增加其信用风险^[1],还会破坏银企信任关系^[16],从而增加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致使纾困目标难以实现。

国家审计基于社会管理者与国资所有者两重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重点监督。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审计对国企有显著的治理效应。具体而言,学者们从以下两个微观视角进行了检验:第一,基于国家审计直接监督效应。国家审计通过开展国企资产负债损益、资本投资、运营和监管、改革等方面审计工作,能够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从而抑制高管避税^[17]、提高国企全要素生产率^[18]等。第二,基于国家审计的间接监督效应,已有研究表明,国家审计能够与其他监督方式协同发力,从而表现出单个监督所不具备的系统性特质,这种协同监督能够抑制国企过度负债^[19]等。

综上,已有文献为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影响因素、供应链金融的经济后果及国家审计对国企的治理效应等提供了重要思路,但仍存在以下局限: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研究边界尚需拓展,其能否赋能国企供应链金融业务,纾解链上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仍缺乏理论阐释与实证证据,制约了审计理论对产业链治理实践的解释力。第二,关于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已有研究仅关注以商业信用为资产的供应链金融能否纾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忽视了国企作为核心主体在其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国家审计、国有企业与中小企业间多元关系的影响,更未能揭示三者间的治理逻辑。第三,现有研究在推动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仍显不足,尚未充分结合供应链金融这一国家战略场景,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理论架构,制约了审计理论在服务国家战略过程中应有的前瞻性与解释力。鉴于此,本文立足供应链金融视角,探究国家审计能否赋能国企供应链金融,纾解链上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并厘清其作用机制,既有助于拓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研究范畴,又为加快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学理支持与经验证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有企业作为供应链核心主体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与政治基础,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牵引带头发展供应链金融、助力中小企业纾解融资困境的责任。然而在实践中,国企凭借其强势地位,侵占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攫取商业信用的不规范行为屡屡上演^[2];同时国企配合度低成为阻碍中小企业通过供应链金融融资的主要原因。而国家审计依托经济监督职能,通过对国企财政财务收支真实合法效益的全覆盖审计,能够强化国企对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

首先,国家审计能够提高国企的信息透明度,有效遏制国企在供应链金融中的机会主义与道德风险行为,并保障贸易背景真实性,从而净化信用传导环境,以确保国企信用精准、高效地赋能中小企业。第一,供应链金融虽能够帮助中小微企业依靠核心企业“主体信用”将商业信用资产盘活,但由于其处于弱势地位,所获得资金可能最终被核心企业以商业信用的方式攫取^[2],并且可能被违规收费,反而面临更大的经营风险。国家审计能够通过财政收支审计揭示并公告国企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以及超额收费等违规情况,提高国企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信息透明度,从而有效遏制国企在供应链金融业务中的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行为^[20],这有利于净化国企信用传导环境,提高其助力中小企业纾解融资困境的质效。第二,真实的贸易背景是开展供应链金融的基础,然而现实中,许多企业为了满足短期资金需求,伪造物流、资金流等,利用核心企业信用骗取融资,这不仅会造成核心企业优质信用的占用,还会增加其债务风险^[1],甚至破坏银企间“信任关系”^[16],最终使得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增加。国家审计凭借其业务循环审计优势,能够通过业务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交叉验证,有效揭露业务和财务的真实性与完整性^[21],如《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披露“在无真实贸易的情况下,所属广东分公司向金融机构确认对关联改制企业的债务,后者以此办理贷款保理业务”等,从而有效降低各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这有利于帮助国企识别贸易背景真实性,避免信用滥用,且基于审计公告公开制度,经审计背书后的应付账款、预收账款等商业信用数据将更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赖,从而有助于降低中小企业供应链金融的融资成本。

其次,国家审计能够通过“激励-容错”协同机制,有效提高国企高管的风险承担意愿,从而增强其对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供应链金融作为中央“六稳六保”决策部署的重要战场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审计监督的重点领域,并且审计机关会以各监管部门发布的制度规范作为依据标准^[22],如国

资委、金融监管机构等,即其会严格依据《意见》(2020)等政策^①,监督国企对信用确权、信息共享等要求的执行情况,推动其更好地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因此,在审计结果与高管考核任免紧密挂钩的制度背景下,基于晋升锦标赛理论,国企高管为获得政治认可与职业晋升,有动机积极响应国家战略,提高其参与供应链金融的积极性;同时,国家审计的“容错免责”机制对国企高管在履职过程中非因主观故意或谋取私利而出现的合规性失误或损失等情况,予以责任豁免的审计处理,从而能够显著降低国企高管对供应链金融业务中信用与经营风险的顾虑。该机制是审计机关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要求的重要体现,旨在为主动作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提供切实制度保障,有效消除其应对复杂经营环境时的后顾之忧。因此,两者所形成的“激励-容错”协同机制有助于重构高管在风险与收益间的决策平衡,通过提升政治收益预期、降低合规风险,形成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国企高管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实质性增强国企对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

最后,国家审计能够发挥“免疫系统”功能,提高国企内部控制质量,从而为国企通过供应链金融纾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提供长效机制。供应链金融作为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有效机制,其健康发展高度依赖核心企业的规范运营和稳健信用。追根溯源,国企信用滥用和侵占中小企业合法权益等不规范操作的本质在于内控机制存在缺陷^[23]。而内部控制作为企业管理制度与控制机制有机结合的产物,是国家审计的重点关注对象^[23]。国家审计能够通过了解、检查内部控制的设计情况与有效性,及时揭露其内控缺失或执行不当等缺陷,提出专业的审计建议并跟踪落实整改,帮助国企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如《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2012年度财务收支审计结果》披露“物资采购系统建设水平不平衡”“物资采购系统与各自的项目管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等管理信息系统之间没有数据交互接口,系统输入控制和外部接口功能不完善,不能对选择供应商的采购行为有效控制等,不利于内部管理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和高效运用”,等等。换言之,国家审计能够帮助国企优化贸易业务内控流程,压实贸易业务内控工作责任,提高相同或相似贸易业务的优化整合能力等,从根源上消灭制度性问题,增强国企贸易背景的验证能力以及信用资源的配置精确度等,从而实现国企优质信用向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可持续传递。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

H: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家审计能够强化国有企业对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本文基于审计署2010—2018年公布的央企集团审计结果公告,手工整理出被审计央企名单,并通过国泰安数据库获取央企旗下A股上市公司,识别出全部被审计央企集团的控股A股上市公司。审计实施时间为审计报告前一年度,即最终可获取实施审计区间为2009—2017年,又考虑到审计发挥的治理效应具有一定持续性,本文最终选取样本区间为2009—2019年。本文以沪深A股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并排除在样本期内存在ST、PT和*ST情况或属于金融业或退市或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其他企业相关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为减少异常值的干扰,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标准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计

本文基于供应链金融视角,构建模型(1)检验国家审计能否强化国企对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

$$SCF_{it} = \beta_0 + \beta_1 PostAudit_{it} + \sum \beta_n ContVars_{it} + \sum Firm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供应链金融水平(SCF_{it})。供应链金融的本质是核心企业将其自身优质信用通过贸易关系,以应付账款、预收账款等形式共享或传导至上下游企业,从而帮助后者以未来现金流为依托进行融资;而国企作为“链主”,其供应链金融水平直接决定了自身信用资源向供应链中小企业的溢出程度。目前,供应链金

^①如2020年国资委等八部门发布的《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 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提出要推动核心企业与各方加强信息共享;2022年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助力中小企业纾困解难促进协同发展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中小企业需要以其持有的中央企业集团内单位应付账款、出具的商票和供应链债务凭证等办理融资业务的,要及时确权”、“要‘支持配合上下游中小企业开展供应链融资,努力实现自身优质信用与上下游中小企业共享’等”。

融业务主要分为三类:应收类融资、预付类融资和存货融资,其中应收类与预付类均为商业信用融资^[2],所以本文以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与预收账款(分别对应于应收类和预付类融资)之和(*SCF*)来构建该指标,并通过对企业年报进行供应链金融关键词的文本分析来进行校正:

$$SCF = (\text{应付账款} + \text{应付票据} + \text{预收账款}) / \text{总资产} \times \text{Textdummy}$$

其中,文本标识变量 *Textdummy* 经企业年报文本分析所得,代表该企业是否开展了供应链金融业务。考虑到已有文献的关键词设计大多聚焦传统业务^[12,24-26],缺乏对供应链金融创新业务的考量,本文将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添加供应链金融创新型业务的关键词,如智能保理、应收账款证券化等,并通过训练有素的 Word2vec 模型拓展关键词以确保不遗漏。经人工核验后,本文开发了新的供应链金融词典,详情见表 1。若企业年报出现表 1 中的任意关键词,则说明该企业开展了供应链金融业务并赋值 *Textdummy* 为 1,反之赋值为 0。*SCF* 值越大,说明国企对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越强。

表 1 供应链金融词典

类型		关键词
传统供应链金融模式	应收类	应收账款融资、应收账款质押、应收账款保理、转让应收账款、押汇、反向保理、逆保理、保理、商业保理、国内保理、国际保理、票据保理、动态折扣
	预付类	保兑仓融资、预付账款融资、货权质押融资、未来货权融资、国内信用证、订单融资、采购订单融资、厂商银、先票后货、先款后货
	存货类	动产质押融资、存货质押融资、存货融资、库存融资、现货质押融资、仓单融资、原材料融资
	综合	供应链金融、产业链金融、供应链融资、供应链基金、供应链投资、大宗商品融资、ARIF、供应链贷款、贸易信用、贸易信贷、金融供应链、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理念、供应商融资、买方信贷、买方融资、买方投资、供应商管理库存、VMI、分销商融资、物流融资、统一信贷融资、金融价值链、营运资本优化、营运资本管理
供应链金融创新模式	平台生态化	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供应链金融公共服务平台、供应链金融信息服务平台、供应链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供应链生态、供应链协同、供应链一体化服务平台、供应链一体化平台、供应链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数智化	应收账款证券化、应收账款资产证券化、供应链资产证券化、供应链 ABS、供应链金融 ABS、供应链票据、商业保理资产证券化、保理数字化、智能保理、电子仓单质押、电子存货凭证、电子供应链管理、电子债权凭证、互联网征信、集成化供应链管理、区块链应收账、区块链应收账款、数字仓单质押、数字票据融资、数字信用凭证、数字债权

国家审计(*PostAudit_{it}*)为核心解释变量。若样本中企业所属央企集团在当年被审计署审计,则该虚拟变量在当年及以后取值为 1,反之为 0;若企业在样本期内多次被审计,则以首次审计年份为准。参考蔡利等^[21]的研究,国家审计的治理效应主要集中于审计实施后三年内,因此本文将剔除实验组中治理效应中断后的观测值^①,以确保治理效应的持续性。本文主要关注系数 β_1 ,并预测该系数为正。

在已有研究^[7,14]基础上,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公司年龄(*FirmAge*)、资产负债率(*Lev*)、总资产收益率(*ROA*)、公司成长性(*Growth*)、独立董事占比(*Indep*)、董事会规模(*Board*)、两职合一(*Dual*)、经营活动现金流(*Cashflow*)、固定资产比重(*Fixed*)、社会审计(*Big4*)、投资效率(*Inveffi*)和过度负债(*Exlev*)。变量定义见表 2。此外,本文控制了年份与企业固定效应。

表 2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供应链金融水平	<i>SCF</i>	(应付账款 + 应付票据 + 预收账款) / 总资产 × <i>Textdummy</i>
解释变量	国家审计	<i>PostAudit</i>	所属央企集团被审计署审计当年及以后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i>Size</i>	总资产取对数
	公司年龄	<i>FirmAge</i>	$\ln(\text{当年年份} - \text{公司成立年份} + 1)$
	资产负债率	<i>Lev</i>	总负债与总资产之比
	总资产收益率	<i>ROA</i>	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平均余额之比
	公司成长性	<i>Growth</i>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独立董事比例	<i>Indep</i>	独立董事与董事人数之比
	董事会规模	<i>Board</i>	董事会总人数取对数
	两职合一	<i>Dual</i>	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取值为 1,否则为 0
	经营活动现金流	<i>Cashflow</i>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与总资产之比
	固定资产比重	<i>Fixed</i>	固定资产净额与总资产之比
	社会审计	<i>Big4</i>	公司经由四大审计为 1,否则为 0
	投资效率	<i>Inveffi</i>	残差的绝对值 ^[33,34]
	过度负债	<i>Exlev</i>	实际资产负债率 - 预期资产负债率

五、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由表 3 可以看出,供应链金融水平最大值与最小值差异显著,且中位数较小,这说明国企对供应链中小企业

①以中集集团为例,其所属央企集团仅于 2010 年接受审计,治理效应持续至 2013 年,故剔除 2014 年及以后的观测值;上海石化所属央企集团于 2011 年和 2015 年两次接受审计,被审计间隔未超过 3 年,故认定其治理效应持续未中断,仅剔除 2019 年观测值。

的商业信用支持程度差距较大且大部分偏低。其余变量的统计信息均维持在合理范围内。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 VIF 检验,结果显示 VIF 值均小于 10,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4汇报了回归结果。列(1)为单变量回归结果,列(2)为仅控制年份、企业固定效应的结果,列(3)汇报了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的结果。结果显示,国家审计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对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假设 H 得以验证。这主要体现在国家审计能够有效提高国企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信息透明度,从而遏制国企的机会主义与道德风险行为,并且经审计背书后的商业信用数据会更易获得金融机构的信赖,从而有效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国家审计能够通过“激励-容错”协同机制,有效提高国企参与供应链金融的积极性,从而实质性增强其对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并且,国家审计能够通过了解、检查内部控制的设计情况与有效性,及时揭露其内控缺陷,帮助国企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从而实现其优质信用向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可持续传导。

(三)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设置国家审计时点哑变量,以审计实施前一年为基期,考察国家审计前3年至后3年窗口期内供应链金融水平是否存在明显差异,表5结果显示, Pre_i 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在国家审计实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间对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水平并无显著差异,平行趋势检验通过; $Post_i$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国家审计针对国企对中小企业提供商业信用支持有着长效赋能作用。

2. PSM-DID 检验

考虑到自选择偏差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应用 PSM 检验构造对照组与处理组重新回归。具体而言,以模型(1)中控制变量为协变量,且为避免过多样本匹配失败造成的样本信息损失^[30],本文根据一比二最近邻匹配原则有放回地筛选出与实验组匹配的对照组样本。在有效匹配的前提下,重新回归的结果如表6列(1)所示,国家审计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即本文结果是稳健的。

3. 安慰剂检验

为验证实证结果是否为其他不可观测因素导致,本文随机分配被审计央企集团的控股上市公司与审计实施年份,以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地,随机选出112个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作为虚拟实验组,其余作为对照组按原模型重新回归,并抽样500次。 SCF 绝大部分抽样估计系数的 p 值都大于0.1,且与真实系数差异显著,这表明国家审计在这500次抽样中对国企供应链金融水平都没有显著影响,即安慰剂检验通过,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表3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i>SCF</i>	0.360	0.583	0.000	2.636	0.000
<i>PostAudit</i>	0.454	0.498	0.000	1.000	0.000
<i>Size</i>	22.884	1.668	19.898	28.636	22.626
<i>Lev</i>	0.509	0.197	0.042	0.937	0.532
<i>Growth</i>	0.170	0.499	-0.692	9.378	0.103
<i>ROA</i>	0.054	0.047	-0.204	0.293	0.048
<i>Cashflow</i>	0.045	0.064	-0.187	0.258	0.040
<i>Fixed</i>	0.259	0.204	0.002	0.849	0.202
<i>Board</i>	2.215	0.200	1.609	2.773	2.197
<i>Indep</i>	37.339	6.406	25.000	71.430	33.330
<i>Dual</i>	0.064	0.245	0.000	1.000	0.000
<i>FirmAge</i>	2.751	0.397	0.693	3.689	2.833
<i>Big4</i>	0.152	0.359	0.000	1.000	0.000
<i>Inveffi</i>	0.035	0.044	0.000	0.560	0.024
<i>Exlev</i>	-0.011	0.149	-0.450	0.367	-0.008

表4 基准回归

VARIABLES	(1) <i>SCF</i>	(2) <i>SCF</i>	(3) <i>SCF</i>
<i>PostAudit</i>	0.071 ** (0.028)	0.120 *** (0.036)	0.131 *** (0.035)
<i>Size</i>			0.052 (0.041)
<i>Lev</i>			0.140 (0.184)
<i>Growth</i>			-0.025 (0.019)
<i>ROA</i>			0.036 (0.266)
<i>Cashflow</i>			-0.133 (0.197)
<i>Fixed</i>			0.152 (0.119)
<i>Board</i>			0.070 (0.112)
<i>Indep</i>			-0.001 (0.003)
<i>Dual</i>			-0.010 (0.057)
<i>FirmAge</i>			0.592 *** (0.162)
<i>Big4</i>			-0.073 (0.066)
<i>Inveffi</i>			-0.366 * (0.194)
<i>Exlev</i>			0.353 ** (0.169)
<i>Firm FE</i>	No	Yes	Yes
<i>Year FE</i>	No	Yes	Yes
N	1817	1817	1817
Adj. R ²	0.004	0.542	0.555

注: *、**、*** 分别代表通过 10%、5%、1% 显著性水平检验;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表5 平行趋势检验

VARIABLES	<i>SCF</i>	VARIABLES	<i>SCF</i>
<i>Pre3</i>	0.008 (0.049)	<i>Controls</i>	Yes
<i>Pre2</i>	-0.036 (0.042)	<i>Firm FE</i>	Yes
<i>current</i>	0.060 (0.046)	<i>Year FE</i>	Yes
<i>Post1</i>	0.148 *** (0.048)	N	1817
<i>Post2</i>	0.128 ** (0.053)	Adj. R ²	0.486
<i>Post3</i>	0.098 * (0.058)		

4. 更换变量

本文参考 Yang 等^[31]的研究,以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与预收账款之和与总负债之比(*scf_Y*)乘以 *Textdummy* 得到替换变量 *SCF_Y*。此外,借鉴周兰等人^[26]所设计的供应链金融词典对企业年报进行文本分析替换 *Textdummy*, 分别再乘以变量 *scf* 与 *scf_Y* 得到新的变量 *SCF_1* 和 *SCF_2*。将上述替换变量放入模型(1)回归,结果见表 6 列(2)至列(4)。可以看出,国家审计的系数均显著,即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5. 异质性处理效应

由于双向固定效应估计的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可能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负权重问题,从而产生偏误,本文参考 Callaway 和 Sant' Anna^[32]的研究,采用组别-时期处理效应加权平均法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通过选择不同的权重,计算四种不同类型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简单加权平均处理效应(*Simple ATT*)、动态平均处理效应(*Dynamic ATT*)、日历平均处理效应(*Calendar time ATT*)和分组平均处理效应(*Group ATT*)。由表 7 可知,四种稳健估计量的系数均显著,即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稳健的。

六、进一步分析

(一) 机制检验

在理论分析中,本文提出了三个可能的作用机制:国家审计能够提高国企的风险承担意愿、内部控制质量以及其信息透明度,从而强化国企对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因此,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引入三个机制变量与国家审计的交乘项,进行重新估计。

首先,参考王美英等^[6]的研究,应用盈余激进度测度企业的信息透明程度(*EA*),数值越大,代表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越低。由表 8 列(1)可知, *PostAudit* × *EA* 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国家审计对信息透明度低的国企有更强的治理作用,即国家审计能够通过提高国企的信息透明度,从而强化其对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

其次,本文参考贺星星等^[33]的研究,以 DIB 数据库中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IC*)来衡量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并将其除以 100 后做对数化处理。由表 8 列(2)可知, *PostAudit* × *IC* 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家审计对内部控制质量差的国企有更强的治理作用,即国家审计能够提高国企的内部控制质量,从而强化其对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

最后,本文参考李胜楠等^[34]的研究,采用企业近三年经行业调整的(减去行业 *ROA* 年度均值) *ROA* 波动程度(以 *t* 至 *t+2* 三年为窗口)来测度国企的风险承担意愿(*RT*)。结果如表 8 列(3)所示, *PostAudit* × *RT* 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家审计对风险承担水平低的国企有更强的治理作用,即国家审计能够提高国企的风险承担水平,从而强化其对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

(二) 异质性分析

1. 基于产融结合的分组检验

已有研究发现,产融结合能够产生信息效应,帮助金融机构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企业的财务与经营状况,从

表 6 稳健性检验

VARIABLES	PSM-DID	更换变量			
	(1)	(2)	(3)	(4)	
	<i>SCF</i>	<i>SCF_Y</i>	<i>SCF_1</i>	<i>SCF_2</i>	
<i>PostAudit</i>	0.133 *** (0.047)	0.240 *** (0.067)	0.093 *** (0.029)	0.151 *** (0.056)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i>Firm FE</i>	Yes	Yes	Yes	Yes	
<i>Year FE</i>	Yes	Yes	Yes	Yes	
N	1169	1817	1817	1817	
Adj. R ²	0.536	0.486	0.468	0.435	

表 7 异质性处理效应

VARIABLES	简单加权平 均处理效应	日历平均 处理效应	分组平均 处理效应	动态平均 处理效应
	(1)	(2)	(3)	(4)
<i>Simple ATT</i>	0.142 ** (0.067)			
<i>Calendar time ATT</i>		0.126 ** (0.064)		
<i>Group ATT</i>			0.147 * (0.077)	
<i>Pre_avg</i>				0.015 (0.041)
<i>Post_avg</i>				0.127 * (0.071)

表 8 机制检验

变量	(1)	(2)	(3)
	<i>SCF</i>	<i>SCF</i>	<i>SCF</i>
<i>PostAudit</i>	0.145 *** (0.036)	0.656 * (0.391)	0.176 *** (0.043)
<i>PostAudit</i> × <i>EA</i>	0.940 *** (0.342)		
<i>PostAudit</i> × <i>IC</i>		-0.338 * (0.205)	
<i>PostAudit</i> × <i>RT</i>			-1.943 *** (0.722)
<i>Controls</i>	Yes	Yes	Yes
<i>Firm FE</i>	Yes	Yes	Yes
<i>Year FE</i>	Yes	Yes	Yes
N	1817	1760	1812
Adj. R ²	0.557	0.565	0.557

而有利于缓解两者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35]。此外,产融结合所产生的决策效应,使其相比同等条件下的非产融结合企业更容易与金融机构达成合作,从而有利于企业与金融机构建立更稳定的信贷关系^[36]。总的来说,金融机构将更有保障且更有意愿为产融结合的企业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而非产融结合企业则面临银企间信息透明度低的问题,且需为银企合作花费更高的沟通成本,从而参与意愿较低。而国家审计能够有效提高国企信息透明度和高管风险承担意愿,所以,本文预期国家审计对非产融结合国企的强化作用将更为显著。

本文参考张新民等的研究^[35],通过该年度国企是否参股金融机构判断其是否产融结合,然后将样本按照是否产融结合进行分组回归。由表9可知,针对产融结合国企,国家审计的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而对于非产融结合国企,国家审计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进一步佐证了国家审计能够通过提高国企信息透明度及高管风险承担意愿来强化其对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

表9 异质性分析

变量	产融结合	非产融结合	法治水平低	法治水平高	市场竞争程度低	市场竞争程度高
	(1)	(2)	(3)	(4)	(5)	(6)
	SCF	SCF	SCF	SCF	SCF	SCF
PostAudit	0.107 (0.069)	0.135 *** (0.044)	0.043 (0.047)	0.204 *** (0.063)	0.085 (0.057)	0.149 *** (0.052)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Firm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FE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400	1402	961	832	877	908
Adj. R ²	0.653	0.564	0.493	0.641	0.618	0.595

2. 基于法治水平的分组检验

中国各地区法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若企业位于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则其供应链金融业务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督,违规行为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这意味着违规操作被发现的概率更高,且面临的惩罚更严厉,所以国企将花费更多的财务与管理成本以确保其贸易背景真实性,这将加剧国企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收益与风险不匹配,导致国企更偏向于“懒庸怠”行为。国家审计能够通过提高国企高管风险承担意愿以强化其对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因此,本文预期国家审计针对法治水平较高地区的国企有着更为显著的治理效应。

参考已有研究^[37],本文以每百万人口律师数量(LAW)来衡量各省份的法治水平,值越大说明该省法治水平越高。接着,本文将样本按照LAW中位数分组进行回归。由表9可知,针对法治水平较高地区,国家审计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对于法治水平较低的地区,国家审计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国家审计强化国企对中小企业商业信用支持的作用会受当地法治水平的影响,针对供应链金融而言,法治水平越高的地区,国家审计效果越好,再次佐证了国家审计能够通过提高国企高管风险承担意愿来增强其对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

3. 基于市场竞争程度的分组检验

根据声誉理论,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企业越有动机建立与维持自己的声誉以增加自身价值。而由国家审计的公告公开制度所揭示的国企供应链金融问题均属于负面信息且具有可观察性,所以当所处行业市场竞争程度更激烈时,企业的这些负面信息将更易引起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因此,出于风险规避的目的,相比市场竞争较弱的企业,高市场竞争程度行业的企业将更缺乏参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积极性。并且,对于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企业来说,国家审计提出的相关审计建议会引起新闻媒体关注,并进行跟踪报道,而企业出于长期利益的考量,面对激烈的产品竞争环境,会更注重整改质量以获取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因此,本文预计市场竞争越激烈,国家审计越能通过提高高管风险承担意愿来强化国企对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且审计整改环节发挥的效能越大。

本文应用基于行业的赫芬达尔指数(HHI)来测度企业的市场竞争程度,该值越大代表市场竞争水平越低,并按照赫芬达尔指数的中位数将样本分组后进行回归。由表9可知,对于市场竞争程度高的国企,国家审计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对于市场竞争水平低的国企,国家审计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这说明国家审计强化国企对中小企业商业信用支持的作用会受市场竞争程度的影响,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国家审计的强化效应越强。

七、结语

国有企业作为供应链核心企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与政治基础,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发挥“链长”以纾解链上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责任。本文检验了在供应链金融视角下,国家审计能否提高国有企业

对链上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研究发现:第一,国家审计能够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增强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及优化内部控制质量三条路径,强化国企对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第二,国家审计的这种强化效应对于非产融结合的国有企业以及处于法治水平较高地区、市场竞争程度较高行业的国有企业更为显著;第三,本研究揭示了“审计介入-国企信用传导-中小企业纾困”的链式治理逻辑,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在产业链治理场域中的解释维度,更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重要支撑。

本文研究具有以下启示:首先,应继续强化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效能。在深化审计结果运用、促进各类监督协同的同时,适度提升对供应链金融业务的监督力度,并通过科学界定审计干预的“安全边界”,确保在助力中小企业融资纾困与维护市场生态平衡之间实现有效统筹。其次,应强化审计与国企高管考核的激励相容机制,以进一步提高国企依托供应链金融纾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积极性。具体而言,应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体系中进一步纳入与供应链金融相关的多维绩效指标,在供应链金融业务合规性的基础上,加大对国企通过确权、平台接入等方式帮助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或主动利用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提高供应链金融服务效率等实际成果的正向激励力度。最后,应推动供应链金融审计实践有机融入审计理论架构,对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的审计实践进行学理化提炼,推动构建中国审计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不仅是完善国家审计对国企信用资源监督理论的内在要求,还是新时代背景下审计学术界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使命。

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第一,本文虽证实国家审计对国企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整体治理效应,但未进一步区分不同类型(如应收类、预付类、存货融资类等)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未来研究可深入分析国家审计对不同业务类型的差异化作用机制与效果,以提供更精准的政策启示。第二,本文虽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的研究范畴,但对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赋能审计监督的创新模式探讨尚不充分,未能充分回应《“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关于“科技强审”与审计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导向。后续研究可深化数字化审计在供应链金融业务中的应用研究,尤其是针对数字供应链金融等新型业态,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俞文源. 国有企业供应链金融业务风险分析及审计策略[J]. 审计研究, 2025(2): 9-14.
- [2] 郭晔, 姚若琪. 供应链关联与中小企业融资——基于供应链金融与商业信用视角[J]. 经济学(季刊), 2024(4): 1173-1190.
- [3] 梁箫. 政府审计能提升国有企业经营效率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4(1): 1-12.
- [4] 白俊红, 卞元超. 政府支持是否促进了产学研协同创新[J]. 统计研究, 2015(11): 43-50.
- [5] 陈凤霞, 姜宾. 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 ESG 表现[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4(3): 24-33.
- [6] 王美英, 汪洁, 侯玉婷. 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产学研合作创新研究[J]. 审计研究, 2024(2): 47-59.
- [7] 潘俊, 文灿, 朱佳力等. 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基于 ESG 评级的分析[J]. 财务研究, 2025(1): 38-50.
- [8] 成程, 杨胜刚, 田轩. 金融科技赋能下供应链金融对企业价值的影响[J]. 管理科学学报, 2024(2): 95-119.
- [9] 陈中飞, 江康奇, 殷明美. 数字化转型能缓解企业“融资贵”吗[J]. 经济动态, 2022(8): 79-97.
- [10] 孙文凯, 王文靖. 中小企业发展的双重扭曲[J]. 齐鲁学刊, 2024(6): 115-124.
- [11] 李晓溪, 钟勃儿, 杨国超.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信息成本与企业融资约束[J]. 会计研究, 2024(11): 79-91.
- [12] Liu X, Zheng Z. The impact of supply chain finance on supplier stability: The mediation role of corporate risk-taking[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4, 65: 105606.
- [13] 邱金龙, 崔梦妹, 潘爱玲. 供应链金融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来自 ESG 表现的经验证据[J/OL]. [2025-06-06] 南开管理评论, 1-32.
- [14] Polak P, Simal R, Hamdan M. Post-crisis emerging role of the treasure[J]. European Journal of Scientific Research, 2012, 86(3): 319-339.
- [15] 付玮琼, 白世贞. 供应链金融对中小农业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2): 140-151.
- [16] 宋华, 韩思齐, 刘文诣. 数字技术如何构建供应链金融网络信任关系? [J]. 管理世界, 2022(3): 182-200.
- [17] 刘瑾, 谢丽娜, 林斌. 政府审计与企业避税[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25(5): 11-20.
- [18] 郭金花, 杨瑞平. 国家审计能促进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0(5): 1-9.
- [19] 郭檬楠, 郭金花. 国家审计监督能降低国企过度负债吗? ——基于国家审计与社会审计协同的视角[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0(6): 95-109.
- [20] 陈文川, 李文文, 李建发. 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金融化[J]. 审计研究, 2021(5): 16-28.
- [21] 池国华, 郭芮佳, 王会金. 政府审计能促进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吗——基于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南开管理评论, 2019(1): 31-41.

- [22] 张强. 供应链金融风险特征及审计应对策略[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 2016(3): 105-113.
- [23] 朱岩, 张永红, 陈东辉, 等. 国有企业供应链金融业务发展与审计研究[J]. 审计研究, 2025(3): 22-29.
- [24] Wang K, Ding N, Wang C. Supply chain finance and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Research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2025, 73: 102620.
- [25] Wang S, Hu H, Fan H. Does supply chain finance improve firms' ESG performance? [J]. Economics Letters, 2024, 247(2): 112098.
- [26] 周兰, 吴慧君. 供应链金融与产品市场表现[J]. 金融经济研究, 2022(6): 99-112.
- [27] 蔡利, 马可哪呐. 政府审计与国企治理效率——基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4(6): 48-56.
- [28] Richardson S. Over-investment of free cash flow[J]. 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06, 11(2): 159-189.
- [29] 徐倩. 不确定性、股权激励与非效率投资[J]. 会计研究, 2014(3): 41-48+95.
- [30] 李邈, 郑志刚. 控制权转让场景下的表决权委托与企业绩效[J]. 管理世界, 2024(10): 189-208.
- [31] Yang Z, Yang X, Ren X. The supply chain financing role of government's stock purchase rescue policy: Stock market stabilization funds and trade credit financing of Chinese listed firms[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2025, 90: 102650.
- [32] Callaway B, Sant' Anna P H C.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J]. Journal of Economic, 2021, 225(2): 200-230.
- [33] 贺星星, 胡金松. 国家审计与内部控制对国企资产价值的作用研究——基于保值增值视角[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2, 37(4): 21-32.
- [34] 李胜楠, 朱屹云, 王佳琦, 等. 国企混改中的治理机制非对称性与风险承担[J]. 南开管理评论, 2024(9): 113-126.
- [35] 张新民, 叶志伟, 胡聪慧. 产融结合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基于商业信用的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 2021(1): 4-16+19-20.
- [36] Halling M, Pichler P, Stomper A. The politics of related lending[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2016, 51(1): 333-358.
- [37] 程金华, 李学尧. 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中国律师职业[J]. 中国社会科学, 2012(7): 101-122+205.

[责任编辑: 刘 茜]

The “Chain-Based” Governance Interpreta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Audit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ational Auditing, SOE Credit, and SME Financing Relief

XU Yuhua^{1a,1b}, LIU Mengna^{1a,1b}, WANG Juncheng²

(1. a. School of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b. United Lab of Statistics and Financ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The issues of high financing costs and limited access to capital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rms (SMEs) are becoming more visible, making it critical to investigate alternative solutions. Using centrally administered state-owned enterprise (SOE) groups holding Hushen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as a research sample from 2009 to 2019,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role of national audits in alleviating SMEs' financing difficulties within their supply chains from a supply chain finance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show that national audits can improve state-owned businesses' commercial credit support for SMEs in their supply chains. Mechanism testing show that national audits have an impact through three pathways: boosting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maximizing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and raising executives' willingness to take risks. According to heterogeneity research, this strengthening impact is more significant in non-industry-finance-integrated enterprises, countries with strong rule of law, and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places.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this study applies state audit governance theories to supply chain finance and identifies a chain-based governance pathway: “audit intervention → SOE credit transmission → SME relief.” It broadens the explanatory elements of China's socialist audit theory inside industrial chain governance scenarios, givi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n autonomous audit knowledge system based on Chinese experience and responsive to real-world difficulties.

Key Words: national audit; supply chain finance;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audit; state-owned enterprise; financing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